

# 轮椅生涯十三年

毛 自 赋

路漫漫而凄迷

……

不必为我哭泣

我本中等身材，一旦落入轮椅，更是矮人一等。幸亏我坐上了巨人的肩膀，又有众人相扶……

我不妄求伟大，但我力争不渺小。

我很平凡 六三年出生，八〇年考上大学，八四年参加工作，八五年成为高位截瘫患者。三十五个春秋，十三个轮椅上的寒暑，人生短暂而漫长。从偏远山区到省城大学，从试用期教师沦为半植物人，舍弃成为数学家的梦想，而自学世界语，不出家门，但朋友遍天下，通过两首小诗，将中国和我的名字，刻上不朽的奖杯——我不是英雄，但我感到英雄般的自豪。这份自自豪属于所有关心和帮助我的良师益友。

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九日，芬兰坦佩雷城。第八十届国际世界语大会闭幕式上，凭《一生》和《裂缝》两首诗，我被宣布获得该年度世界语“文艺竞赛”文学“新人才奖”。我不知道当时的会场是怎样的气氛，更不知道当时在座的几位中国世界语协会的代表是怎样的心情。我获得这个消息，是在八月中旬某天下午五点钟左右。当时，母亲正在给我穿衣服，准备让我起床。我压抑着内心的激动，我平淡地对母亲说：“妈，我几个月前寄出的三首诗有两首诗在外国获奖了。”“多少钱？”母亲问我，她一向忧心忡忡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273 荷兰盾，合人民币千把元。”我高兴地回答。

“汇票呢？”母亲急切地问。

“一般不汇现款。那笔钱存在荷兰的国际世界语协会总部，我可以用来订世界语杂志和购买世界语书籍等。”我不慌不忙地回答。

“唉，拿不到钱有什么意思，发信的邮票钱都捞不回来……”母亲边唠叨边有气无力地将我拖上轮椅。我象一个充满气的皮球，一下子遭到针刺。两分钟之内的充盈与疲软，好不是滋味。难道这就是乐极生悲之道？

自一九五九年国际世界语协会设立“新人才奖”以来，我是第一个获得该项奖的中国人。这项奖原则上每年授予一人。三十六年中有八年空缺。不知是幸运还是其它原因，我第一次参加国际性的文学竞赛就获奖。我初登国际世界语文坛，只不过一年，就得到评委们的首肯。是鼓励还是溺爱？

获奖，尤其是国际性奖，一般都有掌声和鲜花相伴，而我获了奖，没有掌声，也没有鲜花，只有母亲的一声叹惜。

这一夜，我思绪万千，往事如柳絮飘满脑海。

一生中，我很少为成绩而失眠。

我的小学和初中时代，正是文化大革命年代，但因我的家乡地域偏僻，远离“革命”的中心，我们的老师并不鼓励我们当白卷英雄。相反，每个学期结束时老师都能给名列前茅的学生发五好学生或优秀“红小兵”的奖状。每个学期的了奖状，我都交给母亲作鞋底的样纸。母亲的一秒钟的微笑是我唯一的和最高的奖赏。

那时，我也有过失眠。在村里从小学读到初中。我一直都是学校排球队的主力队员。全乡十五个学校十五支球队，每年集中在乡中学举行一次单循环排球比赛。每年参赛的头一个

晚上我都彻夜不眠。因为参赛几天中，我能和同学们一起吃住在小镇上。接连好几天能吃上大米饭和放了植物油的蔬菜，而且闭幕的当天中午还能吃上一餐肉。这种生活在家里除春节外，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在家里，一年四季吃的都是萝卜饭、南瓜饭或是红薯饭。即使是这样，我也很少吃上中饭。因为学校不供应午饭，我家离学校又较远。我好跑回家吃中饭。这样，还可以为家里节约，使他们每个人晚上能多吃上一口。我们家的晚餐通常由奶奶事先按年龄和当天做事的轻重程度为我父母和我们兄妹六人分好了吃的份额，然后各吃各的。这种份额常常让每个人都填饱肚子。至于吃的菜，由于每年只能从队里分得半斤或八两油，味道可想而知。直到七七年进人乡中学读高一时，不得不在校寄宿，每天的三餐由学校统一供应，这样，我终于每餐能吃上米饭了，但吃的菜，都是每逢周末从家里带来的咸菜。那时，我有两个玻璃瓶。一瓶装炒熟了的蔬菜，一瓶装腌的辣椒或萝卜什么的。一次，班主任老师无意中看到我吃的蔬菜——萝卜叶，他不禁摇头说：“哎，萝卜叶本来是下等猪饲料，不放一点油。人怎么能吃？”我只得苦笑着回答：“老师，我不能餐餐都吃辣椒酱。萝卜叶总算含有叶绿素吧。”从此，班主任老师几乎每个月都在班上举行小型统考，数学、物理、化学、语文、外语等交替进行。几乎每次考试我都得第一。每次获得的奖品是六元钱的教工食堂的菜票。当时的菜每五分钱一份，这样我每餐可到教工食堂买菜吃。相比之下，这是天堂般的生活了。从那时起，不识字的父母懂得了好成绩可以换菜票。所以，寒暑假时他们破例同意我几天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而让我住在小镇上的同学家里复习功课。

父母让我在本该挣工分的时候去学习，还有另一个原因。那时就是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每个假期干几天重活以后，我都会患夜盲症。患了这种病之后，刚到傍晚我就得提前收工回家。十五岁那年暑假，有一天收工稍晚了一点，就一路上好几次摔下田埂，弄得从头到脚都是泥。有的天有一二米高，埂坡上长满了杂草，我差一点摔死。为了不让母亲发现我的惨状，在回到家之前，我就先在门前的池塘洗了一个澡。晚饭之后，又参加抗旱车水。水车的地点离家五百多米，煤油灯也看不清脚下的路。象旧社会的煤矿工人一样，我几乎把眼睛贴在地图上，走完那近一华里的路程。第二天，一位好心的邻居把我一路摔跤和摸着走路的情形告诉了我母亲，母亲立即让我休息几天。经过几天休息几天。经过几天休息和吃一二两猪肝，我的夜盲症就消失了。

七八年七月全国高考时，我刚读完高一。那位班主任老师提议我跳级考大学。当时的校长是我的政治老师，他也立即同意我提前和应届生一道参加高考。参加高考的几晚我失眠了，而且每天中午鼻子都出血。结果。我没考上。那年所有的应届生一个也没能考上。我是全乡近百名考生中的第三名。我没去拿成绩通知单，我觉得没考上无所谓，因为还有机会。

七九年我又参加了高考，得了二百九十五分，虽是全乡第一但只上了部属中专分数线。可不知为什么最后连地方中专都未录取我。落榜了，我很沮丧，但我没有失眠。第二天我就卖掉几毛钱所剩菜票，光着两只脚，在浓雾中告别了家乡，摸过一条又一平原沟渠，怀揣高考成绩通知单，第一次来到了离家十公里的澧县第九中学。那里的校长兼物理老师二话没说，收下我继续读书。

八〇年再参加高考，我得了四百二十分，全九中第一，超过重点分数线四十多分。拿到分数以后，我失眠了。那年不是先看到分数以后再报志愿，而是先添志愿后通知分数。我自己填的第一志愿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桥梁设计专业，结果有关老师根据我估计的做分数改成了第一志愿湖南师范学院。以我的实际分数绝对可进哈工大，如果我的志愿不被改的话……最后，我还是高高兴兴地进了湖南师范学院（现为湖南师范大学）。

进师范学院后，我不再有材小用的情绪，而且渐渐爱上了教师职业。八三年到衡阳教学实习时，我是十八人的实习队副队长兼临时团支部书记。实习成绩是优秀。

读大学四年级，我一直是数学系排球队主力。我们系队在全院十多个系的比赛中得过第二名。此外，在全系组织的登岳麓山的比赛中，我得过第一。我一直是个生龙活虎的乐天派。

八四年七月，我被分配到当时的常德地区供销学校任教。学校绿树成荫，环境优美。我所教的学生差不多与我同龄。每天夕阳西下，绿荫丛中，我都与他们一边打排球、篮球，一边说现在、话将来。美好的未来似乎在向我招手。令人意想不到的，这样美好的时光不过半年，一场车祸把我的美好希望和大好前程碾得粉碎。

就在一千九百八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午十一时许，二十二岁的我春风满面，从市郊骑自行车赶回学校，一辆拖拉机猛然从侧面将我从自行车上撞下。没有惊慌，没有一点痛苦，我躺进了常德地区医院特别护理室。傍晚苏醒时，我只知道医生在我的头颅上打孔，护士们在剪我的衣裤。我只意识到我全身麻痹，没想到会终生瘫痪。我现在后悔，当时我没有像电影里一样。悲天号地地闹上一阵。痛失青春与前程，我没机会叹息、呻吟与流泪，更没有机会喊出悲愤与懊悔。当时我很平静，只当是手放在胸口做着全身不能动弹的恶梦。

双臂曲屈于胸前，头上牵着几十斤的铅球。在输液反应引起的高烧中躺在急救室的病榻上，满是思维又没有思维，日夜是梦又不是梦。

一个星期后，大脑完全清醒，我开始明白我当时的状况和可能的后果：第七颈椎脱位，乳头平面以下无痛、触觉，双臂麻木，双手十指不能运动，大小便失禁……超高位截瘫。从此我将被困固定在轮椅上。十几年如一日，寸步难移，自己连侧身的力量也没有，过去龙腾虎跃的情景将成为永久的回忆。这是我外表仍然保持冷静。我不能发怒。我不是公伤，我没有资格在看望我的领导和同事前发怒。我不能叹息，父母兄弟吃苦耐劳供我读书，望我出人头地，今天落到这步田地，已经让他们心碎。我不能愁眉苦脸，给他们再添一份忧伤。我不能哭泣，在日夜轮流护理我的学生面前，我曾时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现在应该也是。我更不能在从昆明赶回的女友面前哭泣，我曾对她过于冷漠，而今我一副惨相，没有脸面在他面前悲哀而让她分担我的不幸。

好比布娃娃，脸上笑嘻嘻，里面一团糟。我在医院里躺了四十多天，出院回到学校时，乳头平面以下仍然全无触觉，双臂稍能屈伸，但两臂外侧毫无痛觉。我想起勃朗宁夫人，坚信自己有一天会重新站立。

我没想到往后的日子会如此艰难。

八五年五月至八六年五月里卧床一年，每餐由母亲用汤匙喂饭，不知道饥饱。每隔几小时由父母托起上下身改变体位。由于大小便失禁，自己除头部以外全身无力动弹。夏天，长褥疮几乎难以避免。

刚出院不久，骶椎部长褥疮，我又一次面临死亡。当时的校领导立即从附近的医院请来医生，医生经过检查，剪去完全坏死的组织，褥疮表面4X5厘米，深及骶椎骨。第一次敷上药以后，我隐约听见医生与校领导在阳台上谈论：许多截瘫患者都死于褥疮的并发症。他如此大而深的褥疮，只恐怕他能走路了，也不会痊愈。对于褥疮，目前世界上尚无特效药……这些话我父母均已听到，本来沉重的心里更添上一块石头。正逢盛夏，持续三十九度高温，正常人也日夜难眠。我纹丝不能动，整天躺在床上更是受火的煎熬。无触觉的皮肤，毛孔不排汗，因而全身的热气都充向脸部，火烧火烤。接连好几天一秒种都不能入睡。吹电扇又马上引起感冒发烧，自己双手又不能使用扇子，父母日夜轮流为我扇风，每隔几小时又给我侧身……如此折腾半个月，全家人的精神与身体都崩溃了。我每天吃二十支冰棍也无济于事。我每天张着大嘴喘粗气，父母一分钟都不能入睡，心烦意乱。于是吵起嘴来。一气之下，父亲跑到了乡下。剩下母亲一人，更是困难重重，母亲一人不能为我翻身，弄得不好我的脊椎又会断裂。白天，每隔几小时请来我的一位校友帮忙，那么晚上的呢？他不能整个晚上也不睡觉。因为明天他还要上课。苦思冥想之际，我请他在床上架起一根木棒，穿上皮带，我用两小臂拉住皮带环，母亲站在床的另一头提起我的双腿，移动一点位置后，母亲下床，她托起我的下半部，我用一只小臂拉皮带移动肩和头部，这样，一、二、三同时用力，终于侧动了身体。从此，像马戏团一样，我的生活中每天都离不开垂吊的皮带。侧身、上下轮椅都得

用上皮带。一段时间之后，母亲不用站在床上也能为我侧动身体和把我扶上垫在臀部的防止褥疮的气圈了。

为了解决头部灼热而不能入睡的问题，我开始想到一个办法。当母亲给我凉开水喝的时候，最后一满口我不咽下，待母亲转过身去，我用手掌把口腔里含的水擦在脸上。这样确实感到一时的凉快，但这种凉快保持不了多久。于是，我要母亲给我找来医用橡皮管，把它一端放在两水瓶里，另一端置于我枕头边，这样我可以不断地往脸上抹水。我不再张口喘粗气，太累的母亲也睡上了几个小时。她不知我用橡皮管并不是单为了喝水。第二天起来，发现我背后的床单湿透，她大发雷霆，说我自寻死路，瘫了又找上风湿病……第二天我反复思考，想出另一个办法，旁边放上一盆冷水。把毛巾沾湿，搭在手腕上，扬起小臂，把不滴水的湿毛巾当扇子用。这种方法果然奏效，后来我每个夏天都这么做。幸亏母亲日夜看护，加上医生的精心治疗和学校领导、老师的关心，三个月之后褥疮痊愈，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从出院回到学校开始，那位女友每天都抽空来看望我。帮我活动手臂，给我读报纸和杂志。她越是对我体贴，我越是对她冷淡。几个月后，每当她来，我都装作睡着。我想得很清楚，自己成了半个植物人，不知何年何月勃朗宁夫人的奇迹才在我身上发生，我绝不能毁了她的青春，绝不能继续接受她的爱。她早已看出了我的心思，但仍然执著。秋天，她又给我买了毛毯，并提来了自己的录音机以及她在湖北荆州世协函授班和昆明社会大学世界语进修团用过的教材、资料、辞典和磁带。我的装睡实在叫她难以忍受时，她就打开录音机，跑回自己工厂的宿舍。我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像母腹中的胎儿接受胎教，好歹都得听。当时，双臂已能自由屈伸，于是，她来过几次又跑过几次之后，我开始捧着留下的初级课本，一课一课的看。其实，在我健康时，她曾提着录音机到我房间里学过世界语。我一度对世界语产生过兴趣，只是那时我没有刻意去学。八五年初她去了昆明以后，我写过一封信给淮南世界语函授部，表示我想参加函授，结果杳无音讯。她不知道此事。没想到我病了之后，她又在我面前摆弄起世界语。由于工厂方面的原因，当时她不得不放弃在昆明社会大学学习世界语。后来，她又完全放弃了学习世界语。事实上，她是我的世界语的启蒙老师。

八六年六月，我住进了长沙市康复医院，从此想与那位女友彻底断关系。但八七年我在湖南津市从湖北黄石市世协邮购中级教材。进入中级学习时，我又写信到她工厂求她寄语法等书给我，但一直没有音讯。后来，她说，她寄给了我，但一些天后，邮局又退给了她。

现在我不知道怎样感谢她。八九年秋，她从出嫁的外省回来，看过我一次。那次，我对她表现得还算热情，因为我知道她已有了归宿。关于我和她的这些，我写了一篇小说，H0, AMY，发表在 *Monato*（一月）12/94，后被选入 *Tempo fugas*（时光逃遁）（*Monato* 1980-1994 25 篇优秀短篇小说选）。

八六年六月到长沙康复医院不久，我开始用右手拇指与其它四指扛起汤匙，自己吃饭，从此，母亲松了一口气，不必每餐先给我喂饭，然后自己吃冷了的饭菜。可是，就在我开始自己吃饭时，我也同时开始靠坐在轮椅上，这给母亲又带来了更多的麻烦。起床穿衣，上床脱衣，上下轮椅要求别人抬。开始上轮椅时，由于长期卧床，突然从卧到坐改变体位造成脑缺血，我经常在轮椅上昏厥过去，这种时候，母亲必须立即用尽力把轮椅翘起，以保持我是卧位。

坐上轮椅后，我开始坐着看书。在长沙康复医院半年就学完了初级课本。

八六年底回到学校后，不少同事都来看望我，其中一位澧县的老乡，是我高中时代同学的妹妹。我撞车之后，她从高校分配到我所在学校，并且成了我的邻居。每天她都和我谈天说地。有一天她上完课，拿着讲义夹径直来到了我的房里，看着我坐在轮椅上用勺子吃饭，她灵机一动，既然能用勺子吃饭，为什么不试着写字呢？待我吃完饭，她展开讲义夹，取出钢笔放在我右手的合骨口和食指与中指之间，调整好了笔尖的位置，她又托起讲义夹，让我在夹好的纸上试着写字。于是，我颤抖着手，屏住呼吸，在纸上划上了几条斜线，接着写上了

她的名字的最后一个人的谐音字，一元钱两钱的“元”。从此，我找来夹子板，在轮椅上放一个搓衣板，每天学习写字。由于手指完全瘫痪，只能勉强夹住钢笔，靠手臂运动，笔尖在纸上轻轻擦上痕迹。手腕颤抖，常常写不上要写的笔划。不久以后，发现彩笔写起来容易些，于是，我开始用彩笔在看书时划重点线，批注查到的生词，也开始用彩笔给同学们写明信片，感谢他们在我不幸时给我精神上与经济上的支持。

八六年春节前夕，母亲又带我去津市一家私人诊所接受中医治疗后，我的双臂活动能力有所加强，体内深层植物神经系统功能有所改善，虽然表皮触觉仍停留在乳头平面以上，但已能感觉到胃痛，大小便也有所反应，靠坐轮椅的时间也可以稍微延长。这样，我每天可以有更多时间看书写字。我手头的世界语初级资料全部学完，一时又收不到向那位女友求寄的语法书，于是，我从手头的资料上查找到黄石市世协中级函授班的地址，便立即写信给黄石世协打听消息，不久收到回信。回信通知了中级的收费状况并要求用世界语写一篇简短自我介绍，以查初级水平情况。我随即按要求写好回信，同时寄出资料费。八七年，除夕那天，我收到了从黄石寄来的王崇芳编的《世界语实用中级课本》及配套的两盒磁带和六册辅导资料，还有胡国柱编写的《世界语诗词格律》等。

在津市三个月，我学完了中级课本的大部分。三个月之后，我和母亲又回到了学校。

回校不久，我托那位校友到邮局为我订了八七年下半年的《中国报导》，自那时起我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世界语。

学完了中级，接着读胡国柱的诗词格律书，我开始进入诗的天堂。那本书的末尾列出了一些常用的压韵词，我觉得太少，于是，在读每期的中国报导时，我在词典中翻阅大量的单词，每查阅一个单词，我着把它归到相同韵的词组中。开始时，我用的是冯文洛五十年代编的《世界语中文大辞典》，通常有词查不到。八七年十一月至八八年五月，我带着诗词格律书去了杭州接受气功疗法。返校后我从北京邮购了张闳凡等编的八七年新近出版的《世界语汉语词典》和威廉·奥尔德编的世界语文选诗歌集。我开始读这本九百多页的诗歌集，同时一面一面的阅读新买的词典。约花了一年多时间，读完了这两本书，记下了四千多分类同韵词。

八九年五月，我用仍然颤抖的手卡住彩笔写下八行诗《南方的五月》，并把它寄到中华世协机关刊《世界》编辑部。九〇年十一月该杂志发表了诗。

收到十一月份的《世界》杂志和十五元稿酬单时，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可借我的腿怎么也跳不起来，只是我的心不停地乱跳。这是我第一次证实，我学的世界语是地道的语言，可以表达诗思的语言。我学到的诗词格律是纯正的，我写的诗可登大雅之堂。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从银行领取款项，而且是稿酬款项。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使用私章，这个十五元，在我的心中，后面可以加上任意多个零，我比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还富有！这是我青春的收据，这是我那位女友的爱收据，这是我母亲日夜操劳的代价，这是我亲朋好友关心我和支持我的回报，这是我生存的价值，这是我活下去的资本……我不是公伤，靠劳保费生活，靠年近七十的父母捡破烂生活。我是寄生虫，我是造类机……不！我有数学家的头脑，我有文学家的天份。我的颈椎断了。不！我有钢铁的脊梁。我不需要榜样，我就是我自己的榜样！不用脚和腿我要走向世界，走遍世界！我要为自己，为父母，为一代人，为几代人创造财富，创造十五亿亿元买不到的精神财富。

五年来，我第一次由高兴而失眠。我狂想，我高傲。

不！我都没有知觉的双脚，稳踏实地。没有脚印便留下轮椅的胎印。

一夜未眠，第二天我依然精力充沛，写下一首二十多行的诗《弯弯的路》。打草稿，修改，誊正，当天下午就寄给《世界》杂志。

九一年六月，该诗又发表于《世界》。九〇年是我通过世界语走向世界的基石年。那年的十一月九号我收到湖南邵阳市世界语者王少波赠寄的 *Penseo* (三色革) 总第二期即该杂志

九〇年八月号。几天后我就写信给该杂志的编辑、黑龙江的石成素，简要说明自己的状况，随信附两首三行呼花诗。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他热情洋溢的回信。从此，石老师与我书信不断，谈生活，谈读书，谈时局，谈文化……从九二年二月起，我的诗接二连三在 *Penseo* 上发表。可以说，*Penseo* 是我诗歌的摇篮。石老师对我不仅有知遇之恩，毫不夸张地说，在世界语中我获得新生，石老师是我的母亲！

结识石老师以后我的写作欲一发不可收。在另一位青年教师也是我的邻居的帮助下，先整理好了那四千多韵脚单词，接着我突发奇想，用诗歌把每组同韵词串联起来，方便自己也方便别人记忆。九一年上半年我按着整理好的韵脚词小册写好了四千多行诗，两百多页，几经修改，自己实在无力再誊正，我求一位班主任在她班上找一个西文字母写得好的学生替我誊正。那位女青年教师满口答应，第二天，一位男生就开始为我抄写。九二年春节前夕，我将手稿两百多页寄给了北京的一位世界语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可能是我写的地址有误，这本手稿一直下落不明。

我没有因手稿石沉大海而气馁。我思量到，寄出去的东西得不到回响，可能是我所写的东西不值一文。本来我是学数学的，对于诗歌，的确是门外汉。于是，在石老师指导下，我写信给一位在武汉读研究生的我高中时代的同学，叫他给我购买有关诗歌及诗歌理论方面的书籍。他一下子给我寄来十几本中外诗歌集和现代诗歌理论的书。同时，我从校图书馆借来几乎所有古今中外诗词的书和杂志，中文的或是英文的。大量阅读之后又回到世界语诗歌创作。

九三年底，在石老师的鼓励下，我写了几首诗给 *Monato* 的诗歌与小说栏编辑、国际世界语文学的泰斗奥尔德先生。仅半月之后我收到他的回信。信中他告诉我他已通过国际世界语协会给我寄来了三本书，一本诗歌创作指书和两本新出版的诗集。他还叫我再寄几首给他，以便凑齐一个版面发表于 *Monato*。就这样，我的第一组诗在国外发表。六月份 *Monato* 发了我的组诗以后，八月该杂志又发了我的第一篇世界语小说《诱惑》。从此，我真正地走向了世界。

九四年初，我托朋友上长沙购买了英文机械打字机。这是我又一次失眠。

吃完晚饭，我开始试着用打字机。首先，打字机放在何处方便我使用呢？写字时放在轮椅扶手上的搓衣板太窄，放不了打字机。如果把打字机放在以前学校配发的桌子上，桌子太低，轮椅扶手不能进入桌面下，我的手根本够不着机键，怎么办呢？不久又想到在双腿上再放一个枕头，和搓衣板一起支起打字机。解决了放的问题，我开始动手按键。原以为与录音机键一样，一只手放上去，是指对准某键，立起小臂一用力，该键就下去了。没想到打字机不同。用一键时，相邻键不能触及。再说，敲键时，要有突发力度。双手只是手腕能活动，十个指头无一能屈伸，上面的动作都办不到。又怎么办呢？想来想去，用铅笔。这之前我已学会用双手捧住钢笔写字，于是，我双手捧住铅笔，用橡皮头敲打机键，这样能打上字母，我好高兴。可是，没多久，铅笔在双掌间打滑，而且双手捧笔后，无法打大写字母和叹号等，再来一个怎么办。已是晚上九点，我不得不上床休息。

想啊想，天亮时，我突然想到用两只铅笔绑成十字架，卡在食指与中指之间。

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我让母亲绑好铅笔，一试，果然灵验。从此，十字架与打字机成了我的写作工具。而后不久，我请木工给做了一张特别的桌子。板面下可推进轮椅扶手，再也不用把打字机放在腿上了。

用上了打字机，从九四年开始我给许多国外杂志投稿，我的诗、小说和书评等先后在比利时的 *Monato*，意大利的 *Heroldo de Esperanto*（《世界语先驱报》），法国的 *La Kancerkliniko*（《癌病诊所》），瑞士的 *Literatura Foiro*（《文学博览》），日本的 *Riveroj*（《江河》），巴西的 *Fonto*（《源泉》），法国的 *La Gazeto*（《杂志》），荷兰 *Esperanto*（《世界语》），保加利亚的 *Esperantista Tribuno*（《世界语者论坛》）等上发表。虽然大都没有

稿酬，但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精神上都有一种不同于画饼充饥的满足。

为了参加九五年度世界语“文艺竞赛”，三月初我即开始准备参赛作品。我从以前写成的手稿中精心挑选出三首小诗，借助于用两只铅笔绑成的十字架，卡在左手食指与中指之间，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用机械打字机打印。总共只有 60 行的作品。却花去了两个小时，这差不多是我整个上午能坐的全部时间。打好之后，立即托人到街上去复印了四份。可由于我打字力度不够，复印稿效果太差，成行成段的无法辨认。这使我非常焦躁，以至整个下午都没有休息好。还没到下午五点，我就恳请母亲提前给我穿衣起床。草草吃了晚饭，立即动手每页再重复打三遍。打完 9 页，已是晚上十一点。内侧还保留有部分痛觉的双臂酸软不堪，腰股深层如沉铅感觉，双脚和腿肿胀如充气的救生袋。来不及洗漱，急忙求母亲抬我上床休息。

稿子虽然打出来了，可邮资又是我犯了愁。三分稿子的邮费需十多元人民币，而我当时的确拿不出这笔钱。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忍痛割爱，将三十多枚外国友人寄信给我的差额邮票卖给一位集邮爱好者，筹足了这笔邮资。第二天上午，即将诗稿装进信封，贴足邮票，托母亲将诗稿投入附近的邮筒。

世界语已给我带来精神上的实惠，我不应该因为获了小小的奖但没有得到母亲的夸耀而沮丧。我应该理解母亲，她捡好几天废纸才够我发一封航空信。她含辛茹苦一辈子，应该是我敬养她的时候了。

通过投稿，我结识了不少中外良师益友。鼓励、支持、关心、帮助……我亲身体会到世界语促进和平友谊的魅力。

石成泰老师八月初函告我获“新人才奖”的同时，顺便通知我，中国报导社的王汉平可能赴常德采访我。这个消息我没立即告诉母亲，担心引起另一种不愉快。由于我本身无力做起码的接待工作，王汉平来采访的事，我预先告诉了我昔日的同事彭世满老师。他是我的同龄人，一向关心和帮助我。九五年十一月，王汉平来后，就住在彭老师家里。

王汉平在我这里三天，还得到了学校有关领导的款待，因此，学校里有许多人了解了世界语，也更理解我。王汉平的到来，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九六年春节前夕，校长给我封了红包，由教务校长和办公室主任送到我家里。九六年四月十九日的《常德日报》报导了我的事。看到了这篇报导后，常德市武陵区残联负责人带着钱和物资专程来看了我。九七年五月助残日时，残联又免费为我装了电话。

王汉平在九六年二月《中国报导》杂志社刊发的有关我的报导以及在《世界》八月号上的《轮椅上的跋涉者》引起了国内外一些朋友的关注。河南新乡的韩道翥，四川成都市的石德文，以及长沙的吴长盛先生等先后给我写信、问候、关怀与指教，我感到很温馨。法国的六十三岁的卓尔卡（Zorka Eniz）女士，荷兰的雅各布（Mandita Iacob）女士，德国与我同龄的韦斯特霍夫（B. Westerhoff）先生以及俄罗斯比我小十多岁的谢夫丘克（J. Shevchuk）先生等先后通过中国报道编辑部，给我来信。信中都充满友好的激情。

卓尔卡把中国当作第二故乡，曾十次到过中国，懂得不少汉语。九六年计划专游湖南，特地安排经常德来看望我，可惜因家人困于战火而未能成行。她给我的第一封信中央寄着一百元人民币。

雅各布女士喜欢中国编织。她手工编织的双喜字图案等在第八十届国际世界语大组展出。在参加八十一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时，她通过中国世协的代表转给我一百荷兰盾。这笔钱我在中国世协兑换成人民币，全部用于购买世界语和英文版中国古典名著书籍，《红楼梦》《三国演义》等。

俄罗斯的谢夫丘克小兄弟自幼因病全身麻痹，发育器官损坏，说话时吐词不清，手也不能写字。他借助电脑，在家于九六年读完大学历史系课程。他自修世界语，他的毕业论文是有关俄罗斯世界语历史考证。他与我可谓是同病相怜，有共同心声。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的韦斯特霍夫夫妇。韦斯特达夫先生是巴哈伊世界语协会秘

书长，在德国从事社会福利工作，其妻陈利群女士是我国广州市人，他们俩通过世界语结为伉俪。陈女士刚去德国不久。就在德国一家航空公司工作。韦氏夫妇从王汉平的报导中了解到我的情况后，立即给我来信向我表示关心和问候，并提出给我购买轮椅，我没有同意。从此，我们之间书稿往来不断。半年前他们信中告诉我，九七年十一月中旬，他们将来中国度假，同时来看望我。

为迎接他们的来访，我立即着手练习口语与听力。可我没有多少世界语带子。为此，国庆节前夕，我便打电话向黑龙江的石老师请教，他立即让我与长沙市的姜老联系，请求帮忙转录。当晚，我又打电话给姜老，没想到姜老是那么地和蔼与热情，电话中他给我简要讲解了世界语的发音要点之后，满口答应给我转录李威伦的教材录音带等。可是，他家没有双卡录音机，于是，放下话筒，我又立即给我在长沙的一位同学打电话，请她第二天到姜老家为我录制所需磁带。国庆节时，这位在湖南教育学院任教的同事，嘱她的学生给我带来了磁带以及姜老手抄的李氏教材第二册和其它磁带与资料。看着姜老那一丝不苟的抄本，我很受鼓舞，尤有相见恨晚之感。

听了姜老那里录的五盒带子，我仍嫌不够。十月十二日，我又打电话给北京的王汉平，请他特快专递给我寄些带子来。十三日，他寄给了我《这是我们的世界》《你说世界语吗？》《海的女儿》《巴基在西伯利亚》等八盒带子。十五日，我收到了带子，但带子都没有配套文字资料，我又写信给姜老，询问他手中是否有相关资料。没想到他又动手给我手抄《这是我们的世界》三十多页。当他到我家后，拿出这第二个装裱好的手抄本时，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心想，这位老人太舍己了，是什么使他如此助人为乐？世界语给他带来了什么？如果他富有，他怎不乐意一下子去复印了事？他怎不让我出复印费呢？想起来，有些令人心酸。现在有多少身强力壮的愿意分文不取，为陌生的人手抄三十页书呢？已七十二岁的姜老能这么做，受之难当。

十一月八日晚九点多。韦斯特霍夫从广州打电话报告他的到来时，我激动得连 *Kiel vi fartas?*（你身体好吗？）都回答不上来。又是一个彻夜难眠。

十一月十二日，下着大雨。中午，姜老从长沙打来电话，说他们一行约晚上七点左右到达常德。我随即通知了彭老师和小余等朋友，彭老师与小余从下午六点钟就和我一起在我家等待他们的到来。晚九点多钟，韦氏夫妇在长沙世协秘书长、国际世协长沙代理姜祖岳先生的陪同下冒着大雨来到我家。当他们踏进我家的大门时，我那颗早已按捺不住的心几乎要跳出胸口。望着他们热情真挚的笑容，捧着韦氏夫妇从德国带给我的礼物——英文版的《尤利西斯》、匈牙利世协出版的《宝藏》（世界语原文短篇小说选）、及其它几本世界语和英文书籍，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这些，在国内是无法买到的。对于我，它们价值连城。韦斯特霍夫一行三人在我家一边寒暄一边计划第二天的活动安排。我随即邀请韦斯特霍夫给我校师生作一次有关世界语与人类精神一体的演讲，他很高兴地立即答应了。近十一点钟。学校教务科长，也就是热情接待过王汉平的彭世满老师把他们带到校外去吃晚餐。

小余非常助人为乐，是彭老师和我都相识的好朋友。我把姜老安排在小余家住宿。小余家离学校不过几百米。从我家到她家，姜老的来去都有小余和她的丈夫陪同。姜老很受感动。

十三日上午，姜老与我临时商议，原计划韦斯特霍夫用世界语演讲改为用英语，以便与我校学生直接对话。韦斯特霍夫十点钟来到我家，用机械打字机准备讲稿。同时，我请来学校英语教师李旭东小姐帮助晚上的演讲，便于与学生更加融洽。姜老与韦斯特霍夫夫妇及李小姐等都相见如故，不嫌我家的简陋，一同在我家吃了便饭，晚餐又由彭科长在馆子里请客。

晚七点三十分，学生会两名干部冒雨把我从我家推到学校阶梯教室。

虽然是周末，但听众的热情很高。能容纳近二百人的阶梯教室早已爆满，各班选派的学生代表，学生会与校团委干部，外语教研室全体教师以及其他科室部分教职工不知从什么时候就等在那里了。在如雷的掌声中我与姜老、韦斯特霍夫等上了主席台。真没想到，彭科长

与外语教研室组织好了以我自学世界语成才报告会为主题的会场。彭科长开场白之后，我讲了几分钟。

一生中这不是我第一次在台上报告自己，初高中时代我不只一次有过类似的经历，但这是我第二次生命中的第一次，离开讲台十二年，又有机会重新上讲台面对渴望的学生与关心和支持我的良师益友，我能说些什么呢？我说不出什么。

我之后，姜老师从“Saluton”（你好）开始向学生讲解世界语及其作用。他的引导性发言生动诙谐，引起了阵阵的笑声与掌声。

接着，韦斯特霍夫作了世界语与人类精神一体的演讲。最后，学生们争先恐后地向韦斯特霍夫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韦斯特霍夫的幽默风趣使在场学生久久不愿结束会议。

十一点后，韦斯特霍夫一行和我们依依惜别。

韦斯特霍夫一行的来访就这样结束了。对许多人来说，这不过是一次很普通的相遇，纯粹是我私人的一次小小的活动。可对于我，这是一次梦寐以求，二次生命中很难实现的体验，我感到三生有幸。不是我个人，而是世界语的魅力，是彭科长竭尽全力组织这次活动。这次活动能使不同国籍、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一群热心人共享掌声与欢乐，应该归功于世界语的创始人柴门霍夫的用世界语促进理解与和平的主张。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十三日下午《常德日报》的两名记者得知韦氏夫妇来访，特地赶到我家对韦斯特霍夫等作了采访。十二月三日的《常德日报》第二版社会广角栏刊登了题为“轮椅上的毛自赋与他的德国朋友”的报导。看到这篇报导，我很高兴，不仅因为我沾了姜老与韦斯特霍夫的光，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世界语在我周围能引起社会的关注。

世界语对我来说，它是实实在在的精神食粮。

九四年初，我在重温《世界语文选》（1887-1981）诗歌卷时，发现三位世界语诗歌泰斗那一年都是七十岁。于是，我根据书后的诗人小传，为他们每人写了一首献诗，寄给了当时在意大利出版的《世界语先驱报》的文学编辑德·格尔格（A. de' Giorgi）先生。九月，我的三首献诗在该报的美文学之角栏刊发。其序文中，格尔格先生写道：“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中国传统诗歌的广袤风景，在这里我们可以证实已发生了跨时代的跳跃和写作风格的革命，难道不奇怪吗？本世纪先锋的趋势也抵达毛泽东后的中国。”在序的结尾，他呼吁专家和学者对我的诗歌提出批评。看到这些，我激动不已。同时，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马上回信给他，八十年代，中国早就掀起朦胧诗的高潮。和那些同胞兄弟相比，我只是个小瘪三。看来，我们的当代文学迫切需要对外交流。

这一期的美文学之角，引起了伊伯利亚半岛青年先锋诗人的关注。西班牙的费尔南德兹（M. Fernandez）首先给我来信，谈对我的诗的看法，并表达和我交友的意向。格尔格在其序文末尾特别点明呼唤的葡萄牙的勒吾斯（G. Neves）也给我写了信，可惜我未收到。后来，他又通过他的西班牙诗友费尔南德兹先生在信中转达他的邀请函，嘱我为一文学杂志组织一期中国专号。还是因为邮件遗失我未能作出反应，失去了一次很好的介绍中国文学的机会。最终，费尔南德兹还是与我保持了联络。从此，他和我成为兄弟般的笔友。他和另意为西班牙朋友瓦伦（A. Valen）先生用电话对我的第一本一百四十页的诗歌手稿逐句推敲，提出大量修改意见，从音韵到意境，从字母到标点符号。这本诗稿形成于九五年上半年，当时，国际世协机关刊主编厄尔特（I. Ertl）先生为法国一家私人出版社组织手稿，他来信提议我出一本诗集。几经犹豫，我答应了他的要求。不出我所料，那家出版社不能如期出书。九六年，我的手稿辗转到瓦伦手中，真是万幸。虽然目前这本诗集还未找到出版社，但对我来说，能有机会得到细致入微的诗学指教，既使不出版业比不加修改马上出版有价值得多。诗学，秘不可传的学问，许多情况下交钱是无法学到的。他们对我无私奉献，我无以为报。九六年，我收到费尔南德兹先生自己的诗集《来自鸣响的孤独》，读了之后，我写了一首二十多行的诗，以诗评诗。收到我的诗后，他激动得泪流满面。接连给几位他的诗友打电话，朗诵我的诗给

他们听。这就是理解产生的激情，这对我也是一种莫大的精神满足。

从九四年起，日本的大西真一(Onish S.)先生一直为我订阅《江河》季刊。作为回报，我也给他寄过两本书。礼尚往来，不亦乐乎？

九五年，《源泉》的主编，荷兰的贝尔赋宁(G. Bervling)先生给我寄来了三卷自传以及为女儿译的诗集。读后，我不仅欣赏到了他那高超的语言技巧，更了解到中西社会生活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为了成为牧师，学过拉丁文，英法德多种语言。婚后与妻子一起学起世界语。在欧洲懂多种语言的人比比皆是，而在我们周围实属罕见。

九六年，由《一月》杂志社资助，我有幸参加国际世界语记者协会举办的记者函授培训班。在该协会主席，德国的马尔(S. Maul)先生的亲自指导下，八课共二百分，我得了一百八十分。获荣誉结业证书，并获《一月》杂志编辑部免费赠阅该杂志一年的奖励。学知识不缴学费，何乐而不为？

免费读书，的确是一种享受。日本《江河》发行人吉川(Yosikawa S.)先生和法国《杂志》两位编辑德·兹拉(M. de Zilah)女士与雅格布(K. Jakobo)先生常常寄书给我。读书写感受，才算真正的读书。我很乐意为他们写小评论。

九六年三月，为给几位为我打扫卫生的学生在日本找汉语笔友，我写信给日中友好通信协会会长栗栖继(Kurisu Kee)先生，他立即给我回复了十页的长信，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写信时，我只知道他是通信协会会长，九五年国际世协文艺竞赛中获杂文部一等奖。没想到，他已是八十五岁高龄，在日本参加过共产党，做过牢，是个遗腹子（他父亲在他出生前自杀）口吃八十年……经过八十年努力纠正口吃，近年，经常在公共场合演讲。他懂世界语、英语、法语、俄语，是捷克文学翻译专家，九七年又开始学习汉语。这一年，他已是八十七岁高龄的人了。他一向是十页八页给我写信，谈自己的不幸经历。谈自己的学习与写作现状。我很受鼓舞，他给了我享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此外，他还经常给我寄来自己新写的作品的复印件和各种各样的世界语和英语书籍。他一生只是个穷困的自由撰稿人。为了给我买星野富弘的自传英日文两个版本，又一次，通信协会的月例会之后，他舍不得与朋友一起进入餐馆共进午餐。买书的钱是他从老婆给他的车费和午餐费中节省下来的，我真不忍心读那本书。

可是那本自传确实值得我一读。星野富弘，七四年毕业于体育学院，七五年给学生上跳马课时摔断颈椎，除头部外全身瘫痪，住院九年。他用嘴咬住笔画画，八四年举行个人画展，一举轰动全日本。

我一度认为自己找不到榜样，读了这本书后，我感到非常惭愧。当然，我得到了更多的激励。

栗栖先生希望我把星野富弘的自传译成中文，因而，给我寄了英文版后，随即又给我寄来日文版。对于日语，我还未能入门就放弃了，我辜负了他的期望。我也没着手直接从英文版译出，我总担心没有出版社接收这本书，而且时常想，我明天可能会死亡，我无力完成长篇大作。

有一段时间，我也想放弃世界语写作，是栗栖老先生的精神感动了我，我才没有陷入悲观而坐以待毙的境地。

在栗栖先生的感召下和石老师的支持与参与下，我在九七年七月一个月时间内根据《周易》64卦写下64首诗。石老师为小诗集写了前言。我把这本取名为《变迁》的小诗集寄给法国的《癌病诊所》杂志社编翩普依尔(J. Le Puil)先生。不久，他回复，拟定九七年十二月出版。日前，这本《变迁》已在法国正式出版。

我感到满足，我感到振奋，世界语不能给我带来面包，但世界语使我不饥饿。九七年七月底澳洲的第八十二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之后，德国的宁思(U. Lins)函告我获九七度“格拉博夫斯基”美文学贡献奖，出乎我的意料。这些年我做了些什么，我有何德何能得到国际

世界语界的溺爱？

我不曾刻意追求名利。石老师也常常告诫我只管播种，不求收获。我不知道我现在是否有所收获，但我会继续播种。

说播种，其实我只不过用世界语写出了我的一些私人体验与对社会的观感。

我们的学校，八八年前在市郊德山。我住的那一栋平房全部是从高校分来不久的青年女教师。有人开玩笑说，我是红色娘子军中的党代表。人们看到我每天都有女同胞和我聊天。是的，她们都乐意关心和帮助我，一有空她们就陪我谈天说地。有的给我借书，有的给我读报纸。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卧床时，我的邻居也是我师大的校友刘小姐送我一本《贝多芬传》。扉页上的赠言是：“把握自己命运的咽喉。”如果传记可算作小说的话，那么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读一本完整的小说。中学时代没有机会看小说。大学四年，我一心扑在数学与英语上，我的借书卡上没有一本小说书名。是那些活泼的青年女教师给我补上了文学的第一课，也是她们在我失去青春的时候仍然感到青春的浪漫氛围。同时，有她们在我的周围，我每时每刻都没有失去对青春的记忆，对生存的渴望。

那些女青年一直对我关怀备至。八八年底，学校搬到了市内。她们中的许多已不再与我是邻居，但她们仍然关心和帮助我，为我跑邮局，为我复印资料，为我借书刊登等。调到外地的会回来看望我，有了丈夫和小孩，她们也没忘记我。我很幸运。一位本身一向关心和帮助我的女职工常和我开玩笑说，我走桃花运。的确，我得到许多女性超越爱情的友情。有人说，男女之间除了爱情不可能保持友情，这话根本不对！

学校搬到市区后。我的新邻居是一对青年夫妇，他们俩口对我更是亲如兄学校距滨湖公园后门只有二百米之遥。八九年四月，一位女教师和我母亲一起把我推到公园转了一圈。当时，那位女教师挺着个大肚皮，距临产期不远。当她推着我走时，人们向我们头来惊异的目光。不了解的人以为她是我的妻子。其时，我自己也想：要是我有这样一位妻子该多好，要是我的生命能在她的腹中延续该多好，要是我接受了那位女工的爱，也许今天她会推着我，要是我健康时我能主动一些，也许她的肚子里早已有了我的种子。我的女儿该上幼儿园了，可以给我倒茶了，可以给我拿书了，可以在母亲去买菜的时候给我从地上捡起从我手中退落的笔了，可以在母亲外出捡破烂时给我打掉在我腿上吸血的蚊子了，可以把火盆从我脚边拿开不致烧伤我的脚了，可以在母亲因操劳过度而发脾气、摔凳子、嚷着要自寻短见时听我说话，分担我不能对任何人说出的忧愁。有了她，我就不必万事都烦劳父母而使他们常常羡慕一下子死了儿子的中年夫妇。我的女儿可以为我刮胡子，剪指甲，贴邮票，可以不厌其烦地每天跑到传达室给我询问和领取信件以免邮件丢失，为我擦掉错别字，清理手稿。长大后可以替我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在会上朗诵我的诗歌，为我领取获奖证书……我喜欢女孩子，我的眼睛不小，我女儿的眼睛一定很漂亮。当她瞪着两只大眼睛呆望着我时，我会写出一首很漂亮的诗。她会给我带来灵感，她会是我的一切……我真的做起白日梦来了。那天，阳光温暖，公园里到处是新发芽的青草与绿树，人来人往，池塘里有人划船……好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这是我遭车祸五年以来第一次上公园，也是我坐轮椅十几年唯一的一次逛公园。以后，我没有再去过公园，我怕我看到那种情景，太高兴或太忧伤而猝然死去。

从公园回来，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动手写了出车祸的经过。那时还是用彩笔写字，手抖个不停。写了几页，头晕眼花，险些从轮椅上栽下来。第二天，我写下八行小诗：

南方的五月

五月，没有初春的阴雨绵绵

五月，没有仲夏的烈日炎炎

俏姑娘，迷你裙

胸脯高傲，步履轻盈

俊小伙、白T恤  
臂膀自满，力量千斤

御下幼稚的羽毛，翅膀坚硬  
迎着和煦的阳光，向明天飞奔

这原本不算什么诗，译成汉语更是俗不可耐。这是我用世界语写的第一次变成铅字的诗，里面就着大部长篇小说难以表达的思绪。我需要五月的温馨，我羡慕青春的展示，我渴望阳光的明天。我曾经拥有过五月，我曾拥有过青春。明天本该属于我，伸手可得的东西面前，就是伸不出手，一切就是这么简单，不用我拐弯抹角。我懊悔，但我无处哭泣，我不能哭泣，我表达欢乐掩盖我的无比忧伤。我已经够忧伤，不能把我的忧伤传染给别人，不能让世界又多一份忧伤。

对于青春和爱情的丧失而不愿与人分担的题材，我写了好几首诗。

大学时代，一位女同学对我很不错，但我断然拒绝了。我遭车祸后，她几次来看我，每次都给我前，有时带着她的丈夫和孩子。我很感激，也很惭愧。为此我写下了《报复》一诗，用反语说她对我的报复以演绎出我曾对她的对她的残忍以及我现在对她的敬重，其中我写到：

为什么 你走过我的囚室  
要留下一束鲜花  
在我常闭的门口？  
羞愧把我痛煞  
你的虔诚 祈祷我  
大病初愈还是死亡？  
得到的是冬天  
为何要用春来回报？  
望着我在垂死挣扎中忏悔  
圆满的了结

爱不仅仅是爱情。九二年夏天，学校有一届学生毕业。一天下午，我正躺着休息，忽然，一名女毕业生来到我房里，拿出毕业纪念册请我签名留言。我感到茫然，我问她是否走错了门。她说就是请我签名留言。我没教过她，与她素不相识，可她坐了下来，滔滔不绝谈起一直对我的关注，对我的默默敬重。我和她谈了一下午，从代沟到当时的社会风尚。傍晚起床后，我在她的纪念册上写下了如下的分行文字：

面对多崎路  
我躺着的音符  
对你苍白无助

天边  
电闪雷鸣  
谁的呐喊  
为你拨开乌云

迎上去  
雨后  
是平坦的路

第二天，她来取毕业纪念册时，给我赠送了一幅苍劲的竹节画。

塞翁失马，有时确实是福。大约九三年上半年，我请人到邮局发了两封航空信。结果因多张邮票没有贴在反面而从长沙打回。一下浪费十几元，我非常心痛。我立即写信给长沙邮局函件科那位经手退信的女士。我根据退信批条上的印章判断退信者是谁。没过多久，我收到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里面还夹有一十八元邮票。后来，她不止一次给我寄来邮票和充满友好与关怀的信件。为此我写下一首《岂止是滴水之思》以表达我对她的敬意，也算是一点回报。

这些给女性的赠诗，大都收录在我的第一本一百四十多页的手稿里。

对那位使我走上世界语之路的女友，除了几首献诗之外，还写了一篇小说，前面已经提到过。

当然，帮助我的也不乏男士。为寄出刚才说到的手稿，八五年八月初，彭世满朋友冒着四十度高温，一天骑自行车跑三次邮局。第一趟因信封不合要求而马上跑回，他又自己动手给我做信封。第二趟因邮局没大额邮票又跑回等待下午调大额邮票再寄。往返三公里，累得他满头大汗，我很过意不去。

这些年我欠下太多的人情债。高中和大学时代的校友严钦金曾帮我上下轮椅，护送我到杭州治疗，为我出了不少力。在杭州，那里读研究生的同学对我关怀备至。九五年，高中时代的同学高家培个人出资给我换了轮椅。刚出车祸时，邵阳的曾海平立即给我在同学中募捐几百元。长沙的陈雅聪同学经常为我买书，还给我经济上的援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学时代的班长樊雄和体育委员黎方，他俩为我付出了很多很多，可惜英年早逝，居然先我而去。我的第一本诗集，本为关心和支持我的所有朋友而作，可惜，他俩看不到它的出版。我为朋友而高兴，我为朋友而悲伤。我拙劣的笔无法表达我对良师益友的感激之情。

人生苦乐无常，诗思游离难捕。

有人说，苦难造诗人。我宁愿不是诗人，我宁愿没有痛苦。还有人说，宗教能使人解脱痛苦。我一度沉迷宗教典籍。我没有因此摆脱痛苦，但却找到不少诗思。我读《圣经》（旧约全书），我的不少诗里运用圣经典故。

我了解儒、释、道教理与教义，我通读三教九流的历史与现状概论。获“新人才奖”的那两首诗就取材于佛教和对儒家学说的背叛。

佛教里说，“无常苦空”，宇宙间一切现象有生必有灭，没有恒长的存在，这种生与灭所显示的人生虽然有短暂的快乐，但是无常的法性在不由自主的坏灭与离散时，使人产生痛苦，更何况人类有贪嗔痴的迷惑，有追求五欲的要求。

佛教里说，每个人一生都充满着苦难。出生本身是一种痛苦，欲望难求是一种痛苦，衰老是一种痛苦，疾病更是令人痛苦。即使有欢乐，乐极也会生悲，于是我写下：

一生

好窄的门 不总是极乐  
使 XY 相逢 注定或是偶然  
无光的迷宫管道 充满震颤  
野菜 茅舍 衣衫褴褛 三千年 哦  
宽容忍耐 从水到土  
解脱吗？逃遁吗？不顾一切 努力  
奋斗 虚空 别拽我 蛮横的手

嫩绿枯黄  
阳光冰雹  
梦来不及开始 眼睛洞开  
瞬间 石头飞沙

啼叫悲号 欢庆丧礼  
摇篮坟墓 过去现在将来 假如  
钟摆不动 墓碑不站立

泪眼溃烂晕花  
脓耳刀绞失聪  
鼻疽流感  
舌长青苔欧石楠 剑刺上下腭  
乱发援耳 尖爪破肤 裙摆绊脚  
或许爱不伤身？  
非也 呶  
有人用爱制造瘟疫  
为自己 为别人

瘟疫 鼠的事情 武器  
设有铁该多好 旱涝饥荒 命运  
子空中胎儿永恒  
传统 政治 宗教 风俗  
真空台风？儿童父亲  
鼻涕 生命泉 云雾上  
开拓者化行星为尘埃。

克己复礼早已不能使人放弃星球大战,仁义道德代替不了法治。现在的人们不会割自己的膀子去喂鹰。现在的人们也不会怕违反动物保护法而不去反击向自己进攻的老虎。相反,我们常常发现狼孩、虎孩。我在诗《裂缝》中表达一种代沟,表达人类正把自己从动物意义中分离的理念。在这首诗的开头我写道:

太阳映在河底  
仍然在我头上  
花往上开,不扎进土里  
妻子在下 侏儒的我  
膝下总是巨人的儿女  
乳臭不干  
这是儒家的孝道,这是儒家的礼仪。可是现在的状况是:  
尊妻在上,……  
……  
章鱼是一朵花!它在空中吗?  
太阳不过是我放飞的一盏灯

我这样结束了《裂缝》这首诗。最后道出现代青年的反叛精神。  
对于诗歌写作本身,我崇尚反叛精神,  
理性的反叛

焚烧偶像  
为冰冷的躯体  
偶像烙在

钨丝的心中

背对圣神  
虔诚 同宗  
前后是佛  
球上的目标  
联通  
千经万纬  
与其盲从  
方圆  
不如明眼  
跳井  
开垦畅快感官  
哪怕一无所获  
知否  
有蛇 烂身  
产子  
让我腾云驾雾  
在你超产的腹中

酒后 与纓斯的谵妄  
比按尺规的条款滋味  
谁更喜欢  
没有起伏的胸廓？  
曲裂的镜面  
刺激欲望

为新生  
赏赐婴儿一把刀子  
佛之利剑  
劈圣神  
斩凡俗

大师  
我要抢夺  
你的权杖 虽然  
原本虚无  
跛腿的我 狂想  
以虚填无  
忍耐的我  
不是哲人 欲望无厌  
使我苦乐无动于衷  
岁月流失 年龄停滞  
远离人山

我享受  
人海  
禅坐  
马拉松

罗丹说过：“真正的艺术家永远是冒着危险去推倒一切既存的偏见，而去表现自己所想到的东西。”我觉得，总是写“红旗飘飘，战鼓擂，万岁万岁万万岁”或者“朋友，朋友，我祝福你。不用千言和万语”会使人生腻。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进高一时，头一个星期整天都得背毛主席语录。我的童年和少年饱经文化革命的“洗礼”。我目睹了1966-1976十年中的狂热与疯狂。童年的体验往往深入人的潜意识。八〇年报考大学志愿时，我仍不敢报中国人民大学。下意识里以为人民大学就是搞政治的，其毕业生就会当官。那时，我不愿当官。我看到文革时可恶的官僚怎样糟践人民。粮食连年“三超”，农民总是吃不饱……，为鞭答那些假大空社会现象，我写了一些1966-1967为标题的诗。

我属于“新三届”。虽然我起步晚，但我写起诗之后，与八十年代的那些朦胧派先锋不谋而合。我读过北岛等人的选集。他们在诗中表达的迷茫与新生交界处的谵妄，与我在阴阳界面的梦呓，可不分雌雄。当然，我的诗艺没有他们高超。

个人的痛苦，文革造就的社会的痛苦使我有写不完的诗材。如果再扩大到人类的痛苦，国际社会的痛苦，可写的诗就更多了。当然，痛苦中总有乐趣，所谓知足常乐。

回忆过去，我写下了八四年与朋友一起游桃花源的观感。

读了《中国四十景》那本书后，我梦游上海的城隍庙，北京的长城，承德的避暑山庄等，写出一组想象中的游记小诗。

英语谚语说，Every dog has its day. 每个人都有幸运的时期。我生活不能自理，我不如狗。但我有比狗强的地方。我有我幸运的日子。

当昔日的学生参加了工作又到常德出差而来看望我时，我觉得我很幸运，他们还记得我。

当常德的世界语者丁时慧朋友与我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而今常常和我促膝谈心时，我觉得我很幸运。世界语又使我结交新的知己。

九六年我参加保加利亚世协主办的文艺竞赛，我获得诗歌三等奖。虽然奖品只是几本书，我仍然感到很幸运。九七年我又参加了这项比赛，又获了奖。虽然因为邮局或其它原因，我连作为奖品的书和获奖证书都没有收到，我还是觉得幸运——我的名字和地址以及获奖诗在保加利亚的《世界语者论坛》上刊登。读了该论坛后，意大利的罗斯(N.Ross)先生随信寄来他的早期诗歌译著《痛苦》与我共讨痛苦与诗歌的关系。罗斯是瑞士出版的《文学博览》杂志编辑部成员。

不幸中总有万幸。我的父母仍然健在，虽然我父亲不能在我身边。

我母亲七十多岁，一生经历磨难，而今还能为我料理一切，为我洗脸穿衣，抬我上下轮椅。买菜洗衣做饭之外，还坚持捡破烂补贴家用。她三十三岁丧夫，一人拉扯三个孩子还要赡养婆婆，几年后与我父亲结合，又生下我和两个妹妹。长期与我父亲感情不和，她一直后悔第二次婚姻。我的惨状更使她恶梦难醒，苦海无边。她老人家经常歇斯底里。精神错乱，她仍然呆在我身边，十几年难得回几天故乡。我庆幸，我有这样伟大的母亲。

我庆幸。我的兄弟姐妹都很关心和体贴我。虽然都生活在偏远山村，他们还是省吃俭用，经常乘车来看望我和母亲。每逢春节，大哥都送来一担年糕和猪肉。大妹妹资助我购买房子，虽然只有部分产权，但必定使我在学校有了一个栖身之所。

我庆幸。历届校领导都对我宽容以待，要不然我住在加急电报几天难以到达的农村，广交各国朋友是万万不可能的。

我庆幸。学校教职工都宽厚地对我，让我分享他们的一份经济成果，使我能够维持生活

并享受日常医疗待遇。

我庆幸。我的大脑一直清醒。我给一些学生辅导数学和基础英语，从小学生到大学本科自考生。我帮助过几个青年教师通过职称英语考试。他们乐意帮助我，我更想有机会给他们一点回报。

我不只一次想到过一死了之，但我更多的时候觉得自己不完全是个废物，生存下去还有价值。

目前，全身表层的知觉仍在乳头平面之上，双手十指运动功能尚未恢复。双腿时常痉挛，坐轮椅和躺在床上时，膝盖处和踝关节用带子绑住。虽然植物神经系统功能有所改善，胃的不适于大小便时在大脑中有所反应，我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我仍然依靠母亲全面照顾。我还能生存多久？我不去考虑。母亲百年之后，我如何生存？我无法考虑。

路漫漫而凄迷，我将求索每一秒钟！今天属于我，我依然期望明天会更好。

草就于  
湖南省常德市光荣路  
常德是信息工程学校

一九九八年一月